

ZHEJIANG LISHI DASHIJI



浙江

历史大事记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主 编 魏 桥 执行主编 周祝伟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浙江

历史大事记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主 编 魏 桥 执行主编 周祝伟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浙江历史大事记/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魏桥主编,周祝伟执行主编.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213-04360-4

I. ①浙… II. ①浙…②魏…③周… III. ①浙江省-地方史-大事记 IV. ①K29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9855 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电脑制版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插 页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浙江历史大事记

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主 编 魏 桥 执行主编 周祝伟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王福群 陈 春

戴文英

厉 琳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787×1092毫米 1/16

52.25

104.8万

6

201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3-04360-4

18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邵正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养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

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赵世瑜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

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为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序 言

浙江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距今 40 万年前,地处浙北的安吉就有远古人类活动的踪迹,掀开了浙江历史的序幕。在距今 1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原始人群“建德人”已在浙西繁衍生息。

春秋时,浙江分属吴、越两国。秦汉时,在浙江设立会稽郡。唐代,浙江先后隶属江南东道、两浙道,渐成浙江省级建制雏形。五代十国时,临安人钱镠以杭州为首府建立吴越国。宋代,南宋王朝建都临安(今杭州)140 余年。元代,浙江属江浙行中书省。明初改元制为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辖 11 府、1 州、75 县,省界区域基本定型。清康熙初年改为浙江省,浙江省的建制至此确定。从新石器时代灿烂的河姆渡文化算起,浙江迄今已有 7000 年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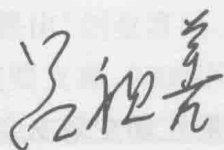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全省人民依靠勤劳智慧,不屈不挠,自强不息,书写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一颗颗史前文化的明珠,撒落钱江南北,璀璨夺目,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一位位仁人志士,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贡献卓著,彪炳史册,为浙江赢得“人文渊薮”的美誉。

历史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开发好、利用好这笔资源,使之成为全省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是时代赋予全省史志工作者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在省委、省政府加快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之际,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学术力量,通过系统整理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编纂出版了百余万字的《浙江历史大事记》。这部大事记,上起浙江历史发端,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时为序,通贯古今,以翔实的资料清晰地勾画了浙江历史发生、发展的轨迹,是一部严谨的、实用性很强的资料性专著,一部科学性与实用性兼备的致用之书。这样,连同去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 60 年编辑出版的《蓬勃发展的进程纪实(浙江 60 年大事记)》(“浙江 60 年发展历程纪实(1949~2009)丛书”之一),省地方志办公室集中各方面力量,把浙江从古到今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了系统、完整的梳理。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浙江学术研究的空白,对全省人民了解历史、开创未来具有重

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为推进文化大省建设作出了新的贡献。

当前,浙江正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希望全省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紧紧围绕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总结经验得失,探索发展规律,不断开拓进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共同谱写更加辉煌壮丽的历史新篇章。

浙江省人民政府省长



2010年9月16日

编写说明

ZHEJIANG

浙江历史大事记

一、本书系浙江区域史大事记,上起浙江历史的发端,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1949年10月1日。

二、编纂原则:遵循“大事则书,变古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示则书,后有所因则书”的原则,存真求实,明古详今,力求全面记载浙江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乃至宗教信仰、人民生活、社会风俗,以及自然变异等诸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特事,全方位地展示浙江社会由古及今的史事要略。所记史事,一般注明资料出处,以备查考。

三、体例:本书采用编年体,但在具体的条目记述上兼用纪事本末体。我国采用公元纪年自民国元年(1912年)始。民国元年之前,本书取中国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及干支纪年的方法;自民国元年(含民国元年)起,取公元纪年括注民国纪年及干支纪年的方法,以月、日为序记事。史前考古时期,以距今年代为序记事。

四、本书历史时期(含先秦时期)一律以中央王朝断代为记述单元。史前考古时期以新、旧石器时代为记述单元。涉及分裂时期浙江境内建立王朝政权的,兼注当地王朝政权的历史纪年。

五、本书所记史事一般限以浙江境内发生之史事为记述对象。但为尽可能全面、系统地记载和反映浙江的历史,一些全国性但事涉浙江地方的政令、制度等的颁布、实施,如民国元年的改用公元纪年及“着各省施行”的制度、政策或其他,以及浙江籍著名人物在浙江境外有重要影响的活动,等等,也酌情适当予以记载。

六、为了尽可能全面、系统、完整地反映浙江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变迁情况,对于各行各业以及一些延续一年或贯穿数年的特大事件,采取先立专题编写,然后再将专题大事记的条目,依年月日为序编入大事记全书。

七、对于同月中持续数日的事件,为便于检索使用,视情况适当地集中于一条记述,以免条目过于烦琐。对于事件发生的日期,如引自报刊而报刊又无确切发生日期记载的,则依报载日期记载,记如“×月×日,《×报》载”,或某月“上旬”、“中旬”、“下旬”、“月底”、“是月”、“春”、“夏”、“秋”、“冬”、“年初”、“是年”等。来自历史资料而无确切月、

日的事情,根据可以确定的时间段置于记事的时间序列之中,若无法确定其在一年中的时间段的,则以“是年”置于该年记事之末。同日发生的不同事情,次条标以“同日”记载。

八、关于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考虑到浙江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故采用目前我国的习惯气候划分法,即以12、1、2月为冬季,3、4、5月为春季,6、7、8月为夏季,9、10、11月为秋季。“春”置于5月之后,“夏”置于8月之后,“秋”置于11月之后记述;“冬”置于2月之后与民间习惯殊为乖悖,故仍置于12月之后记述。

九、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原则上以卒年系之,但亦有因人因事而根据历史人物实际情况,以生年或产生重要影响的活动如重要著作的撰成年份、出任重要职位年份等系之。

十、对于历史著名人物的重要活动或事迹,分条逐项按时间顺序记入相关条目。同时亦酌情以一个特定年份如生年、卒年等,综述其生平及贡献、地位或影响。

十一、具有重要历史影响的会议、著作、文件等,简要介绍其主要内容,指出其影响、贡献。

十二、本书所引用史料,由于历史原因其表述有明显错误者,行文时径直加以改正。若难以改动,则加引号。

十三、外国人物,译名采用通行译名,如查无依据的,则用音译。对中国人物,一般用正名,不用字号;个别习惯称字号或其他的,则仍依习惯。所记人物,凡有官衔、职称者均予注明;如同月中出现次数较多者,则酌情省略。

十四、机关、团体、企业一律用全称。经常出现的,酌情使用简称,但在首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并括注简称。其他团体的简称,在不产生歧义并符合通例的原则下使用。

十五、语言文字力求做到明白通顺、言简意赅。

目 录

ZHEJIANG

浙江历史大事记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 习近平

梁 / 63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序 / 赵洪祝

陈 / 68

序言 / 吕祖善

隋代 / 70

编写说明 / 1

唐代 / 74

五代十国 / 107

旧石器时代 / 1

宋代 / 120

新石器时代 / 3

元代 / 225

夏代 / 9

明代 / 271

商代 / 10

清代 / 314

西周至春秋时代 / 12

中华民国 / 475

战国时代 / 17

附 录 / 775

秦代 / 22

一、浙江历代建置沿革表 / 775

西汉 / 23

二、明代浙江督抚一览 / 788

东汉 / 27

三、清代浙江(浙闽、闽浙)总督
一览 / 792

三国·吴 / 35

四、清代浙江巡抚一览 / 796

西晋 / 41

五、民国期间浙江军民长官一览 / 801

东晋 / 44

主要参考文献 / 803

南朝 / 54

宋 / 54

齐 / 60

后记 / 821

旧石器时代

约 40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2002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在浙北的安吉、长兴、湖州和德清等地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重点考察了西苕溪中游地区的二级阶地,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安吉境内,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地点有 13 处,获得 186 件石制品。其中,上马坎试掘坑出土石制品 29 件,以及磨圆良好的砾石 9 件,属于未经打制的石器备料。29 件石制品又可分为断块、石核、石片和石器,最多的是石片,占石制品的 51.72%,基本可分为断片、半边石片和完整石片三类。一般形态较为规则,表明人工锤击法打片技术已具有较高的水平。石器只有 2 件,均属宽刃类,器身较大,加工粗糙,为非常用型石器。另外,采集到出自下部地层的石制品有 12 件,打片和修理石器均用锤击法,特点与试掘坑所出相一致。脱离地层的石制品,先后采集到 66 件,多发现于阶地堆积所形成的网纹红土的地面上或半埋于土中,主要亦采用锤击法打片技术,修理方法和方式与地层中所出大体相仿。

通过对安吉上马坎的地层堆积及其出土的石制品进行研究分析,并结合与之邻近的安徽省宣州市陈山、向阳旧石器地点剖面对比论证,初步推断上马坎第五层年代略大于距今 45.5 万年,第四层约为距今 36.4 万年,第三层约为距今 12.6 万年,为中、晚更新世界面期,第二层已进入到更新世晚期,大致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或晚期。另据报道,2005 年发掘结束的红土层下的砾石层,可能属于早更新世(距今 300 万~100 万年)的晚期,保守估计在 80 万年前。这一推断还有待现代科技测年手段的进一步验证。但总体而言,上马坎旧石器遗址石制品组合特点是个体多粗大,石器以块状毛坯为主,砍砸器是其主要类型,且刃口偏钝,可以肯定属于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

通过野外考古调查,填补了浙江省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空白,为浙江省境内丰富多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溯源研究提供了有意义的资料,同时填补了地域缺环,与邻接的皖、苏、赣、闽连成一片,扩大了南方主工业的分布区。由于发现旧石器地点之多,

浙江省还一跃位于华东地区各省之前列,上马坎遗址等还很可能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张森水等:《浙江旧石器调查报告》,载《人类学学报》2003年第2期;张森水等:《浙江安吉上马坎遗址石制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4年第4期;徐新民:《长兴县发现的旧石器》,载《人类学学报》2007年第1期)

约10万年前的“建德人”

1974年冬,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浙江省博物馆合作,在建德县李家乡新桥村乌龟洞内发掘出一枚人的右上犬齿化石,除其齿冠远端外侧稍缺一小块之外,其他部分均基本保存完好。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鉴定,认为犬齿化石形态较“北京猿人”有明显进步,而与发现于广西的“柳江人”和北京的“山顶洞人”十分相像,为更新世晚期后一阶段的智人类型,遂命名为“建德人”,其生活年代大约距今5万年。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建德人”生活年代的数据测定受到了质疑。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系年代测定实验室公布了在建德乌龟洞中同上部地层人类牙齿化石伴出的牛牙化石标本采用铀系法测定年代数据。据此,“建德人”的生活年代应为距今10万年左右,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应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即处在母系社会初期阶段。此时远古人类已学会以打制石器为工具,并且可能已经学会用火,是人类社会划时代的进步。同时,它表明至少在距今10万年前,浙江建德一带已经有人类繁衍生息,这也为在浙江发现更多远古人类化石带来了希望。(韩德芬、张森水:《建德发现的一枚人的犬齿化石及浙江第四纪哺乳动物新资料》,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8年第4期;建德县志编纂办公室编:《建德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陈铁梅:《我国旧石器考古年代学进展与评说》,载《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约1万~2万年前的桐庐智人化石

2000年5月,在桐庐县印渚镇延村的石灰岩洞中,发现了8块人类头盖骨化石和近百块古动物化石,经送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这些古人类化石为智人头盖骨碎片和一块下颌骨化石。后经南京师范大学用铀系法年代测试,大致年代为距今1万~2万年前或更早,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此外,在临安市玲珑街、於潜镇、太湖源镇也曾发现有打制石器,距今年代大致为1.2万~10万年前。(马时雍主编:《杭州的考古》,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8~9页;林华东:《浙江通史(史前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25页)

新石器时代

约 10000~8500 年前的“上山文化”

2000 年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博物馆联合对浦阳江上游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在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发现了上山遗址。2001、2004、2005~2006 年,对上山遗址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 1800 平方米,遗址分布总面积约 2 万多平方米。据对陶片的碳十四年代测定,遗址所属年代基本确定在距今 10000~8500 年。上山遗址是浙江、也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2005 年嵊州市甘霖镇小黄山遗址发现了与上山遗址相同类型的遗存,两遗址都位于向杭州湾汇聚的两条河流的上游河谷地带,代表了浙西南山区向浙东平原地区过渡地带的一种较早期的考古学文化。根据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原则,2006 年 11 月,这种考古学文化被正式命名为“上山文化”。

上山遗址内涵新颖独特,以敞口盆为典型器的陶器群和以石片石器及石磨盘、石磨棒、石球等砾石石器为特征的石质工具,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但原始农业已开始萌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上山遗址中还发现了比较规矩、整齐的圆形或者近方形的灰坑、干栏式房基以及沟槽式房基遗迹。这种类型的建筑布局与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有相似之处。

在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陶中,其坯土的植物掺和料主要是稻的颖壳。分析表明,上山遗址的古稻可能是具有现代粳稻、抑或是热带粳稻的一些特点的原始栽培稻,该遗址是亚洲栽培稻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同时,它还为后来浙江境内杭嘉湖平原的跨湖桥文化和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稻作文化提供了合理解释。尽管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时期的水稻栽培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仍然保留早期原始栽培稻(旱稻或热带粳稻)的一些特性。

上山文化的发现是我国早期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对研究稻作起源意义重大,对浙江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及其相互间关系问题的认识,对我国东南沿海地

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及其发展演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郑云飞等:《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均载《考古》2007年第9期;王心喜:《小黄山遗址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考古学观察》,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约 8000~7000 年前的“跨湖桥文化”

跨湖桥文化是以浙江杭州市萧山湘湖及其周围地区为主要分布区的考古学文化,2004年12月由考古学界正式命名,距今年代约8000~7000年,主要有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跨湖桥遗址位于萧山城厢镇湘湖跨湖桥西南。下孙遗址则位于跨湖桥遗址东北约2公里处的下湘湖地界。其中,又以跨湖桥遗址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分布面积亦最广。

1990、2001、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多次联合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木(竹)器、骨角器,发现了灰坑、黄土台、残存墙体等建筑遗迹。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独木舟和“中药罐”。独木舟呈梭形,为松木材质,残长5.6米,宽29~52厘米,船舷厚2.5厘米,最大内深15厘米左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独木舟,被誉为“中华第一舟”。在独木舟的两侧还发现有木桩、木板、木料、船桨、砺石、石镞、编织物等数十件文物和炭灰遗迹,故而推知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加工修整独木舟的现场。“中药罐”实为侈口鼓腹尖圜底的陶釜,釜内盛有一捆经煎煮过的植物茎枝,这为我国中草药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跨湖桥遗址因之入选“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朱倩、蒋乐平记录整理:《聚焦跨湖桥》,载《中国文物报》2005年1月7日)

约 7000~5000 年前的“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主要分布在浙江东部的宁绍平原,尤以余姚河姆渡、田螺山和慈城傅家山等遗址最为重要。其中,河姆渡遗址位于宁波余姚市河姆渡镇,浙江省考古队于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发掘,遗址面积约4万平方米,由4个相互叠压的文化堆积层构成,距今年代约7000~5000年。文化遗物丰富,保存完好,文物特征与长江流域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不同,因之被考古学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遗址中有大量制作精巧的石、骨、木、陶质的各种生产工具,其中成批的骨耜是主要的农具。遗址中保存着家猪、家狗和水牛的遗骨,说明饲养业已经诞生。为数颇多的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的骨骼,说明狩猎和捕捞在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遗址中还有雕饰花纹的彩陶以及玉质和象牙制作的工艺品及骨哨等器具。最为人关注的是,河姆渡遗址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遗存,其中堆积最厚的达1米多。这是当时我国发现最早的